

责任编辑：荆 得  
封面设计：沈蓉勇

艺海沧桑五十年

顾也鲁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875 插页2 字数105,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册

ISBN 7-80518-176-0/J·23

187  
定价：2.00元

## “夜读丛书”出版前言

长日退隐，夜幕降临，当你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准备怎样打发这难得的闲暇呢？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自是一种消遣；读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书籍，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

学林无垠，书海无底；兴趣不同，要求各异。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是希望能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合口味的读物，让读者们伴着书本，度过难忘的夜晚，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夜读丛书”。

“夜读丛书”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它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力求短小精悍，简练明快，不拘一格，让人易读和爱读；它的出版是系列化的，每辑十种，一次推出，各种之间没有一定联系，但也注意了品种的搭配，力求“营养”丰富，不致使读者“偏食”。

“夜读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已多次重印，总数超过100万册，并被评为1986年“上海青年最喜爱的十本书”的丛书之一，其中《沧桑亿万年》、《被毁灭的城市》被评为全国优秀地理科普读物。第二辑在“上

海书市”期间被评为1987年“你最喜欢的十本上海版新书”之一，其中《〈金瓶梅〉漫话》获1986年度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第三辑问世后，也获得读者好评。其中《家长的修养》被《中国妇女报》主办的“向全国妇女儿童推荐最佳优秀图书活动”评为优秀图书。此外，各辑中还有多种被选为省、市的读书活动推荐书目。

这些，鼓励我们继续编出了第四辑。这一辑的题材和内容较以前更宽泛，更雅致，有了更多的名人著作，还首次收入了德国著名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漫画全集，《要你来破的奇案》把读书与推理思考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欢迎读者继续批评指正。

# 目 录

一	童年迷戏 .....	1
二	初次登台 .....	5
三	被老板开除.....	10
四	怀念茅丽瑛烈士.....	18
五	第一次进摄影棚.....	22
六	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	27
七	难忘的舞台事故.....	32
八	与“佳人才子”同遭难.....	36
九	《小房子》的命运.....	43
十	“袖珍小生”由来.....	46
十一	叫“错”口号.....	49
十二	与周璇三度合作.....	53
十三	念英茵.....	59
十四	十一影友结金兰.....	63
十五	华北演剧感慨万千.....	68
十六	银幕情侣.....	77
十七	“大光明”始末.....	88
十八	追记香港“影学”活动.....	99
十九	投身人民电影事业 .....	117
二十	与周总理两次握手 .....	124

二十一	而已乎?也鲁乎? .....	129
二十二	不堪回首话干校 .....	133
二十三	塑造资本家 .....	142
二十四	尝试演喜剧片 .....	150
二十五	在颠倒寒暑中演戏 .....	157
二十六	忆韩非 .....	165
二十七	夕阳无限好 .....	168
二十八	再上荧屏 .....	172
附:顾也鲁电影、电视、话剧演出年表 .....		177
后记 .....		180

## 一 童年迷戏

60多个年头过去了。童年往事记忆犹新。它像储存于电脑似的，偶尔一点轻微的触动，也会清晰地骤然再现于眼前。

我的老家是江苏吴县的一个小镇。父亲在上海的海轮上工作。我7岁那年，父亲带着母亲、姐姐、哥哥和我到上海去玩，全家逛了名闻遐迩的“大世界”。

“大世界”一进门就是各种哈哈镜，有的把你照得又瘦又长；有的把你照得又矮又胖；有的把你照得奇形怪状，孩子们在哈哈镜前，照得笑声不绝，可是我却没有多作停留，而是很快被喧天的戏剧鼓乐声吸引了。

原来，“大世界”有很多演剧场，京剧、绍剧（的笃班）、申曲（沪剧）、杂技、文明戏、电影同时在各剧场演出。我们来到绍剧场。台上演的是什么戏我一无所知，只见一个脸和动作活像一只猴子的演员，正和穿着古装的美女在格斗。可演员那五彩缤纷的服饰、化妆，却使我感到仿佛来到了神仙世界，眼花缭乱，心痴神迷。他们打得最精彩的时候，台下观众鼓掌叫好。我也跟着乱叫，可是没有叫在点子上，惹得前排观众都回头看着我，朝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也

傻乎乎地笑着，我父亲却窘得叫我不出声。

舞台上戏演完了，观众都已散去，剧场已经熄灯，可我仍坐在剧场里不肯走，还在等待下一幕戏……

回到家乡，进学校读书，脑子里还老是盘旋着“大世界”看到的那幕精彩的戏，逢人就讲那讲不清楚的故事。后来还是老师告诉我，我看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不久，我们镇上也来了草台班（走江湖的绍剧团）。镇上没有剧场，就在广场上搭了舞台，四周用白帆布围起来。场内没有座位，观众得自带长凳。我得到了草台班要来演戏的消息，欣喜若狂。戏班子的宣传员穿上戏装，一个敲鼓，一个打锣，挨家挨户宣讲演出的节目。我比他们更积极，奔向同学家去游说：快点吃午饭，早些去看戏。其实太阳刚从东边升起，草地上的露水未干，有的刚起身在吃早饭。

我没有吃午饭，一心一意地渴望立刻能看到演出。我是到得最早的观众，剧场门口的收票员还在煮饭呢！那天演出的故事，我还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其中有个主角叫“张飞”，使丈八蛇矛。他肉搏厮杀的本领真大，令人神往。看完戏，我心花怒放地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要学习他们演戏。我把饭桌当舞台，用竹杆作长矛，扫帚当马鞭，在桌子上模仿刚看过的绍剧表演动作。我入神地想演一场“武功戏”，谁知“马鞭”一扬，一个跟头摔了下来，头撞在砖上，流了不少血，至今额角上留下一道伤痕。但从那时起，

命运似乎就把我同演剧艺术连到了一起。

也是7岁那年，我父亲皮肤上长了毒瘤，生命垂危。父亲不相信西医，由上海回到家里，乡下没有好中医，当时医药条件又很差，父亲是活活痛死的，终年只45岁。我母亲那年才40岁。

家里倒下了挣钱糊口的大树。怎么办？母亲考虑了很久，第二年决定把我送到无锡表姑妈家去。表姑妈家是个富农，有很多地，大部分都自己耕种。她家有长工、丫头，有两条牛。她说愿意把我当儿子看待，还要让我读书，长大了帮她管账。我母亲非常高兴，满意地回到了吴县。

可是，母亲走后，我并未进学校读书。表姑妈说：“家里有两条牛，由那个丫头放。她比你大7岁，已经15岁了，以后让她去种田，放牛那份事由你接替。放牛比读书惬意，先跟她学学。”那个丫头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叫她大姐姐。我跟大姐姐一起放牛，确实比较惬意。青草多的地方可以由它自己觅食，我在树荫下休息。

有一天，无锡城里的锡剧班子也到乡下来搭台唱戏。我没有钱，进不了剧场，只好在外面听。戏演到最后一幕，戏班子不收门票，招待观众，称之为“放堂戏”。我把牛拴在树旁，也钻了进去。那天演的是《珍珠塔》中“方卿见姑娘”一段，方卿正在唱道情，借以嘲讽姑母的势利，这比绍剧有意思，我联系自己，完全可以看懂。

没有想到，这次看戏使我失去了衣食寄托。由于



我贪恋看戏，老黄牛没有吃饱草。表姑妈知道后，满肚子不高兴，训斥了我一顿，并通知我母亲将我领回。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母亲来了。她见我又瘦又黑，以为我病了。在表姑妈面前，她忍住了悲痛，但从无锡回吴县途中，两眼噙满泪花。她既为我少小失父、别人家的饭难吃而悲伤，又为今后生活的艰难而焦虑！我安慰母亲说：“人穷志不短，再苦也要回家。我在表姑妈家并没有白吃饭。回到家里，我要读书，空余的时间，我劳动，不白吃饭。”母亲点点头，转愁为喜。我还补充了一句：“以后有戏班子来，不花钱的放堂戏，我还是要看的。”

童年细事，本不足道。但在我稚气未开的幼小心田里，曾经受到艺术甘露的滋润，这同我后来终于选择了这条虽然辛苦备尝但却乐于为之献身的艺术道路是分不开的，所以敝帚自珍，觉得还是有书写一笔的必要！

## 二 初次登台

1934年，我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晚上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读书。学校里有3个课外活动小组：演讲组、歌咏组和话剧组。我毅然参加了话剧组。

夜校话剧组取名“吼声剧社”。剧社请来了话剧界享有盛誉的欧阳山尊和李丽莲。他们夫妻为了搞戏剧运动，不仅不拿任何报酬，还自己贴本钱到各剧社执导，热心扶持。他们首先介绍我们排演丁西林创作的独幕话剧《压迫》。作品写的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早已付了房租给房东小姐，租下3间房，房东太太认为这位男房客是单身汉而坚决不同意出租；房东小姐恰恰相反，就是要租给没有家眷的人。房东太太与男房客争论不休，而且去找巡警来解决纠纷。恰巧这时来了一位女子，她也要租房，接待女房客的正好是男房客。两人从不相识到互相同情，并默契装成吵过架的夫妻。巡警到来，发现女房客是男房客的太太，符合房东太太的心意，矛盾遂得解决。

这是一出很有趣的轻喜剧，30年代的业余剧社几乎都演过。我多么渴望能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呀！但是《压迫》中只有两个男角，一个是房客，另一个是

巡警，都要高大的身材，而我那么瘦小，当然都不合适。我想能干些剧务也行，所以还是挤在分配角色的会议桌边。剧中的3个女角，房东小姐不出场，房东太太由女同学演，老妈子由男同学反串，而女房客未定。导演欧阳山尊正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伤脑筋。忽然，将目光射向我，并问剧社负责人我叫什么名字。

“顾也鲁，18岁。”剧社负责人回答。

“18岁，长得那么矮小！”导演注视着我，然后转身对李丽莲说：“让他来试试女房客如何？”

李丽莲的一双眼睛像激光器，对着我扫描，终于笑了起来：“长得倒挺秀气的，可以试试。”

我心里忐忑不安：让我演女房客？第一次演戏扮女人，行吗？



1934年参加“吼声剧社”，第一次演话剧《压迫》，饰女房客

导演问我：“试试演女房客这个角色行吗？”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行……”

“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呀？”

我激动地说：“这又不是唱京戏，可以搞男扮女装！”

导演说：“岂止京戏中有男演女的，话剧中我父亲（欧阳予倩）就反串过女角。现在这个戏中的老妈子，不也是男同学刘仲芳反串的吗？”导演抽了一口烟，又说：“男人演男人还是本色的。男人演女人，演好了，就更有艺术光彩！”

我说：“我不是不愿意反串女角，只感到女房客是剧中的女主角，由我来扮演，怕砸了这个戏，辜负了导演的栽培。”

后来，由于导演的鼓励，我终于接受了女房客这个角色。于是，我开始注意观察女同学的一切动作。当时我不懂什么体验生活，我的创作方法就是模仿。从小看戏，养成了习惯，看什么学什么，现在演女人，就要学女人怎么走路，说话也用尖嗓子；白天在商店里工作，每个女顾客，我都要审视一番，把她们的言谈举止，印在脑子里。

《压迫》正式演出了。我在台上，心想，反正是业余演出，演得好坏无伤大雅，没有精神负担，结果反倒演来轻松、自然。演出后评价不一，有的说太做作，有的说很像女人，导演则称赞我有演戏的天才——我体会这是导演对我的鼓励。

接着我又参加了“蚁社”<sup>①</sup>的“蚂蚁剧团”<sup>②</sup>。这

是30年代的一个业余剧团。我看了他们演出的田汉的《金宝》之后，立刻要求参加。后来分配我参加演出欧阳予倩编剧、郑通导演的《同住三家人》，我演20多岁的账房先生。

《同住三家人》演出那天，请来了著名化妆师辛汉文。因为导演在匆忙中没有向化妆师交代人物的年龄，化妆师把我化妆成50多岁的老账房先生，还给我装上了胡子。我对镜子一看，很吃一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下子增添了30多岁，跟排练时判若两人。

登台后，我感到首先要有与角色年龄相适应的老年体态，于是弯腰曲背，说话的语气也尽量模仿老年人的腔调。下台后，团长李伯龙批评我在演“文明戏”<sup>①</sup>，我感到有些委屈，但对自己在舞台上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却颇为得意。有的观众说，一个10多岁的青年能演50多岁的老人，也算勉为其难了。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多么年轻、幼稚啊！但或许正因为年轻，才敢于如此大胆而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我那时学戏尽管步履蹒跚，却从此迈出了以演员为职业的人生道路。

---

① “蚁社”前身为《青年之友》周刊，成立于1928年，宣传青年对社会要负起责任。后成立“青年之友社”，主要组织者为许德良、沙千里、李伯龙、徐赓敖等，被国民党禁止。1930年改为“蚁社”，社员以中下级职员为主。“蚁社”设“蚂蚁图书馆”、“蚂蚁剧团”、“蚂蚁补习学校”、“蚂蚁歌咏团”、“读书会”、“时事研究”等组织，反对旧社会的不合理制度，拥

护共产党，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 ② “蚂蚁剧团”团长李伯龙，团员有徐赓敖、何惧、张庚、徐步、吴仞之、章杰、徐以礼、陈钟、郑通、庄华、桂伊薇、蒙纳、曼燕、吴自明、张茵露、左慕伊、也鲁等，从事戏剧运动，演抗日话剧。
- ③ “文明戏”是中国的早期话剧，演员根据情节大纲，在舞台上自编台词即兴表演。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一定的宣传作用。辛亥革命失败后，文明戏逐渐走上商业化道路，日趋衰落。

### 三 被老板开除

两次登台,使我对演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每天晚上都去参加排戏或演戏。那时我和冯白鲁都调到“生生牧场”(牛奶公司)当小职员。我们志同道合,都喜欢戏剧艺术,他写戏剧评论,我当演员。“生生牧场”在郊区法华路,而我所参加的剧团在南京东路的大陆商场,骑自行车来回得一个半小时,排完戏回到牧场宿舍,总在深夜12点钟了。但我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我已经走到了戏剧艺术的大门口,要努力跨进去,登堂入室,探骊得珠。

1936年,我参加“蚂蚁剧团”演出夏衍、田汉等创作的《走私》、《毒药》和《号角》等独幕话剧。可是第一天在“湖社”公演,帷幕还未拉开,就来了许多警察,勒令禁演。理由是:我们所演的戏,都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

第二天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蚂蚁剧团’第三次公演,昨晨又遭禁止。三剧均经教育局通过,千余观众愤懑填膺,徒呼奈何,有数百观众,且有因之泣下者。”七君子<sup>①</sup>之一沙千里是“蚁社”执行委员,又负责职业界救国会,他的职业是律师,就由他出面向英租界当局抗议(前两天英工部局禁止“星期实验小

剧场”②在“新光大戏院”演出，史良同志代表星期实验小剧场抗议)。两次禁演斗争，对我触动很深，我初步认识到戏剧艺术不仅是消遣娱乐而已，它是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强大武器。

后来我参加了职业界救国会。在救国会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中，我常常担任纠察。我骑着自行车探路，看看前面是否有巡捕(警察)阻拦。巡捕见我来去频繁，大声骂道：“小赤佬，你又来了！”接着用木棍殴打。我夺下了巡捕的木棍，快速蹬着自行车，向游行队伍的领导汇报。

沙千里说：“小顾，你倒很勇敢，不过单枪匹马跟他们斗可不行，要群策群力地斗。”

我说：“我的斗争意志，是您激励和教育的结果。”

当时“蚁社”有一首《蚁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词，黄自作曲：

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  
蚂蚁是集团组织的大众，  
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蠢虫，  
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植新文化的种，  
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



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这首歌鼓舞我为争取自由平等、为民族革命而斗争。

有时白天参加抗日示威游行，深夜我和冯白鲁在街头写抗日标语。我们两人都长得矮小，冯白鲁骑在我脖子上用木炭在墙上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还参加了救国会成员王碧澄、王婴等组织的另一个“立信剧社”<sup>③</sup>，到工厂、农村去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夜》和活报剧。我们到浦东郊区农村演出，没有舞台，我建议就在打谷场上搭台。少年时，家乡的戏班子就是临时搭的台，演出效果也很好。于是，农民兄弟卸下门板，搭成舞台，供我们演出，并且主动放哨，防备特务来捣乱。几次演出，起到了激励人民大众抗日情绪的作用。沙千里对我们说：“话剧是宣传抗日最好的形式，要再接再厉。”

我遵照沙千里的指示，又参加了“蚂蚁剧团”的街头演出。在沪西工厂门口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用耍猴子戏的形式，在空地上敲起锣鼓，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观众越来越多。不利的是有时连警察也被吸引来了。遇到警察干扰，我们就另换一个地点，反正没有舞台装置，道具简单，一个鼓，一面锣，一根鞭子，随身携带，说走就走。

在曹家渡演出时，被“生生牧场”的一位同事看到了。他是“生生”老板的亲信，向来就注意我的行